

# 边上言说

王光明  
著

选择文学和喜欢大学院墙内的生活，  
于我都是一回事。

只有在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地带，  
才有可能于人生诸多的限定与不自由

中赢得心灵的自由。

才有可能不像独眼龙一样只注目

于经济指数的增长，  
进而重新肯定精神和思想的价值。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 边上言说

王光明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上言说/王光明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719-657-0

I. ①边… II. ①王… III. ①杂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0255 号

## 边上言说

---

作 者 王光明

责任编辑 唐晓燕

助理编辑 陈秋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网 址 www. hx-read. com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19-657-0

定 价 38.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 目 录

## 边上言说

- |    |           |
|----|-----------|
| 3  | 说边缘       |
| 6  | 说使命       |
| 8  | 说人生       |
| 11 | 说大学       |
| 14 | 学院升格与大学之道 |
| 16 | 说学问       |
| 18 | 说学习       |
| 20 | 说读书       |
| 22 | 一本书的拯救    |
| 25 | 说书店       |
| 27 | 说治学       |
| 32 | 说诗歌       |
| 34 | 回望百年中国诗歌  |
| 37 | 说意境       |
| 41 | 说散文诗      |
| 46 | 说散文       |

# 目 录

- 132 近年的中国诗坛  
 134 当代诗歌答问  
 141 公刘《读罗中立油画〈父亲〉》赏析  
 144 与错误和忧伤对抗  
 147 感觉与心灵的风景  
 152 爱情诗研究的起点  
 154 挽留温暖生命的元素  
 156 从蝴蝶到黑蛾  
 159 转型时代的回声  
 161 灵魂肖像 性情文章  
 164 说出过程的复杂性  
 166 现当代散文的向导  
 169 散文的可能性  
 178 读蒙田随笔  
 184 读嘉·高兰特《葡萄的卷须》  
 186 逆行的黄包车  
 189 陈嘉庚的意义  
 191 悲歌一阙  
 195 “晾晒”被遮蔽的领域  
 198 谁是别墅的主人

## 书边留话

- 203 《2002—2003 中国诗歌年选》前言  
 210 《2004 年中国诗歌年选》后记  
 212 《散文诗的世界》初版后记  
 219 《灵魂的探险》后记  
 223 《面向新诗的问题》后记

- 225 《文学批评的两地视野》代序  
238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后记  
243 《开放诗歌的阅读空间》后记  
246 《语言与文学的策略》编选说明  
249 《我们时代的文化症候》后记  
251 《市场时代的文学》后记  
253 后记





人格上的独立，在社会文化诸问题中，发挥清理、甄别、预测、建构的功能。同时，边缘位置更能使知识分子不带偏见地面对时代、历史和现实社会，体现真正的社会良知和文化良知。真的，边缘是必要的距离和高度，如德勒兹·柯塔利所说：“假如作家置身其脆弱社区的边缘，更能表现另一个潜在的社区，塑造另一种意识或感性。”

意识到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认同自身的边缘地位，既是一种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也意味着价值向度和话语姿态的自我调整。研究、说话和写作，不只是独立、自由对权势的抗争，同时也是不使别人屈从自己的平等态度，从而真正把思想的表达变成一种自由、平等的对话。文化工作者的使命，不就是通过自由、平等的对话，争取心的理解、同情和升华吗？

1994年2月

## 说 使 命

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历史的转型期，人对时间的感觉是悖论性的。经验过程的每一天都觉得紧张而又疲惫，感受生存的不易和应对的困难；而在每一过程的末端，又总感到时光的迅疾与无情。我们面临一种巨力的牵引，也不知是天堂还是地狱，飞升还是坠落，无法反顾，不能前瞻，也缺乏平静的心情。这就是现代生活吗？

经历了许多晴阴交织、善恶纷呈、焦虑与信心并存的日子，我奇怪自己竟获得了一分难得的安宁。是的，边缘与中心的位置正在迅速地调整，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调换了社会生活的主角，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并开始分解与隐形，代之以商品话语权威的无形统治。这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千百年占据主角位置的读书人最为不适与焦灼的时刻。队伍的分化与公众社会的冷淡不断把我们推向双重孤独的临界点：好梦难续，田园将荒，如入无人之境。然而，谁能说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形象到现代面貌完成转型、重塑自身的历史契机！也许从根本上看，这不是被抛弃和遗弃，而是一次换血与更新。置于边缘地位不一定是坏事，不再受宠和看护的同时，依赖性、附属性与奴性也随之取消，焕发出自觉和自强精神来。如此，角色到位，学科独立与展开便出现可能的前景。这正

## 说人生

人生是一部人在写，人在读的大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写它，不管你有没有读懂，不管你写得辉煌或者黯淡，不管你觉得美丽或者悲凉……人生永远无法重复，神秘而又庄严，熟悉而又陌生。

面对着这部神秘而又庄严的大书，你有什么话可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谁敢说自己摸到了人生的底牌？谁敢为他人的人生描画一张可以按部就班进行施工的图纸？历史上有多少人一夜成为富翁又一夜沦为乞丐？它把伟大的亚力山大的后裔变为罗马的木匠，把史西利的暴君送进哥林多的课堂，而半个世界的霸王到头来却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真实的人生状态从来就是这样在必然中充满偶然的转折，不能推理，无法规范，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和人生际遇，各人有各人欲望与能力之间的距离。所以，我常常对诸如人生格言、警句、哲理之类的东西抱着既恭敬而又不敢照搬的矛盾态度。恭敬，是因为许多书的确写得好，充满人类的智慧和情趣，能使我产生由衷的尊敬；不敢照搬，是由于再明晰的道理也常常无补于每个具体人生难题的解答。

人生的问题更多不是一个接受理念、树立样板的问题，而是展开实践、不断领悟的问题。好在叫我写序的这本《读不尽的人生》并不是一本自以为

生命敞开与寻求自我超越的向度不断实践的问题。任何道理和方法都代替不了个体生命的实践过程，最重要的是追求本真的生存姿态和真诚坚韧的实践品格。

边  
上  
书  
说

1991年8月

## 说 大 学

今年春节，一个现在当了老板的学生请我去吃饭。这是一个学业优异、颇有才气的学生，我曾希望他在学问上有所拓展，不想他终于耐不住大学院墙内的贫困与寂寞，被滚滚商潮卷入下海。这样也好，日子过得滋润，有汽车和手提电话倒在其次，让人放心的是他干得投入并且有一种事业感。其实，一个人活得好不好，就像鞋子穿在脚上，合适不合适只有自己知道一样，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坚信自己工作的意义，是否觉得切合个人的兴趣和找到了用武之地，是否体会到心灵的充实和生命的快乐。真的，作为一个教师，我当然愿意唤起学生对于专业的热爱，但也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从别的角度看大学，也并不完全是美好的。更何况今天的大学，常常是连医疗费也难以报销，自筹的那部分工资也长久地发不出来。

然而，不曾料想的是，这位学生弃文经商原也不是对学问失去了热情和信心，而是被与我有关的生活“教育”的结果。席间，他告诉我：十年前，他和两个同学跟我一起到火车站行仓库领取几包我刚出的学术著作。行李员说：“书挺沉的，把车开过来吧。”“我们哪有车，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哼，还是写书的教授呢，连个小科长也不会这么寒酸！”学生说：“这带鄙夷的一声‘哼’，就这样把我的一生给决定了。比茨威格写的一分

钟决定历史还要快。从这刻起，我就知道自己不愿老死在学校里了。倒不是想活得出人头地，而是想向人们说明，知识分子真那么低能？”

学生激愤有加的叙述让我震惊，这事自己在场，大概当时他们是怕伤了老师的自尊心，才没说什么吧？可我自己也未觉察什么，是不是这类事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呢？我并不赞成学生的价值比较，更不认同这种“证明”自己的方式，但这位学生的瞬间“觉悟”，确也让我思考大学在社会转型中的境况。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经济发展是主流，大学里的师生，不可能在这潮流中占有影响的位置。过去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讽刺大学教授一辈子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指的是那种脱离现实，钻牛角尖的态度。然而目前真正严峻的问题，并不来自大学的封闭与保守，反而是商业化潮流形成的一套物化意识形态在制造偶像、操纵传媒，形成新的话语威权。在这种状态中，不是学院的价值体系溢出社会，反而是学院中一些知识分子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附和潮流作秀，失去了大学智力自治，不能根据距离和空间深入研究问题，对文化失真局面进行反省和调节的特点。

在这样的境况中，大学中那些皓首穷经的“穷教授”、“傻博士”因他们韧性的坚持而显得分外悲凉和悲壮，倒是诸如那些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为换工作而读学位，为了能够生存下去而巧立名目的“办班”等种种“小世界”现象更叫人无奈和忧感。大学是学习知识的地方，锻炼思辨力的地方，也是培养理性与良知的地方，虽然它未必能够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素质与操守，个人的品性还有待人生经验与生活实践的塑造与检验，但青年人步入大学，过几年非功利性的求知求真的生活，无疑有助于他们在走出院墙参与社会竞争时，既有相当的知识与智力的准备，又知道运用知识与智力的限度，使我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尽早结束“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那种贪婪、不择手段、不讲游戏规则的现象。

我觉得大学在社会中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没有必要迎合肤浅低俗的社会潮流，大学生在学习期间也不必那么事事务实，天天考虑如何适应社会，而是要努力让他们以求知求真为目的，书生意气地度过自己的大学年

华。这种想法或许是不合时宜的，带有某种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的色彩，但在这个纷纷扬扬、五光十色、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生存，能够认同和承受孤寂可能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实际上，孤寂本身不完全是坏事，它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当然是与一个世界隔绝，像一种疾病；但它也有正面的意义，这就是争取沉思的空间和自由思想的时间，以便反省生存的时代，寻找自我的身份，追求精神的归属。

1997年4月



高等教育固然要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输送专业化人才，但这些人才同时必须具备运用知识与技术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取向，而大学文理并举的结构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正可以避免单纯专业教育的工具主义弊端。

但名号的升格和规模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观念和风貌的转变。就像强调科研的重要性，增加拨款和定出指标，却不一定意味着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平衡一样；就像任何一所大学，都有为大学争光的人，也有大学为他争光的人一样。大学之“大”，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大楼与大师之所以不能等同，或者说一些大学之所以能够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正由于行的是以学术自治的方式献身真理、科学，服务社会的“大”道。这就是通过蔡元培、梅贻琦等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奠定的“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冯友兰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中国大学的精神品格，它滋养过许多学子的远大抱负与人格完善。

处在调整发展的过程中的许多大学，一方面，仍然受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体制与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市场时代和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压力，处在诸多的矛盾中。但办大学应该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坚持以自由问学的方式服务社会的传统，以人格培养和畅想学术为本。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认为，在现代技术专制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压力中，大学的意义就是能依靠学术自由的传统与象征权力，卓然独立于“权势之外”。他说：“如果轮到我对大学进行解释的话，我将说，在学术机构领域内，它是历史的最后策略之一。荣誉通常也是权势的一种损耗，而在这里它干脆是权势的消除，是权势鞭长莫及之处。在这里除了研究和说话之外别无他务。我想说，这就是高声谈论他的研究梦想，而不必去判断、选择、推进，不必去屈从于某种有指导的学术活动。”

2007 年 6 月

## 说 学 问

年轻的时候听我们的老系主任、《易》学专家黄寿祺讲授六经常识，以及与他的弟子张善文喝酒聊天，在对他们的博识广记钦敬之至的同时，我也曾在心里犯过嘀咕：在大学院墙里搞学问，就是这般皓首穷经、厚积薄发么？在这背负着生存之累、资讯传媒如此发达、日日被“创新之狗”撵得连停下撒尿的功夫都没有的年头，那些抛书包、掉书袋式的学问，人们顾得过来么？如今当自己也搞了些年学术研究，同时读了他们比砖头还厚的《周易译注》、《周易辞典》之后，方知当年我这等毛头小子的浮躁与僭妄：再好的设备和方法也无法替代人们献身文化积累的精神和研究问题的具体实践。

《周易译注》和《周易辞典》是倾注了作者几年心血，凝聚了他们许多心得与创见的学术著作。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他们超越前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不敢妄加评论。但从它深得要义又通畅雅驯的译文，探源溯流，博采广见千百年又择善而从的考据注疏，以及以文字训诂通经史大义的治学风范，分明既体现了从汉到清实事求是的传统学术精神，同时又接受了现代学风的有益启迪。他们以朴学为基础，从古注入手又以象数、义理为主干的学术原则，有着极深的学术渊源。事实上，黄寿祺本身是直接师承吴承仕的，吴承仕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而章太炎又是清末经学鸿儒俞樾的人室弟子。

## 一本书的拯救

一个人的一生能读多少书取决于境遇，与什么书相遇则可能是前定的命运。

我最难忘的书，肯定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于1982年由中华书局初版。我是1983年离开北京前在琉璃厂新华书店的库房里找到它的，而阅读则在这年的深秋。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有雨的深夜，在福州长安山木屋里读到它的结尾时，情不自禁地大哭了一场。虽然那些年我为自己流过好几次泪，但这次泪是为历史与个人的关系而流的。

如果按照卡夫卡的观点，只有有了“悲剧”这个词，悲剧才会发生。我想一定是《万历十五年》决定了我在20世纪80年代不能用青春的心情感受那个已经让人怀念的年代，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几近深渊的边缘。

什么是深渊的边缘，通俗的说法当然是再走一两步便跌入万丈深渊。但对我来说却是对自己生活与工作意义的绝望，觉得个人的挣扎和努力于事无补，像在黑纸上写字，越描越黑。

《万历十五年》于我是难忘的，却不是值得感谢的。

值得我感谢的书是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